



改变未来

莫里斯·奥布斯特菲尔德分享担任IMF首席经济学家的职业经历

莫里斯·奥布斯特菲尔德 (Maurice Obstfeld, 以下简称莫) 将于 2018 年底卸任 IMF 首席经济学家的职务, 在接受《金融与发展》杂志 (以下简称本刊) 记者吉塔·巴特 (Gita Bhatt) 采访时, 他分享了自己对贸易紧张局势、不断扩大的不平等、教育的重要性以及中美关系的看法。奥布斯特菲尔德计划卸任后重回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。此前, 他已在伯克利执教 24 年, 是该校杰出的学院派经济学家, 曾经参与两本重要国际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工作。来自哈佛大学的吉塔·戈皮纳斯 (Gita Gopinath) 将继续任他在 IMF 的职务。

本刊: 在宏观经济方面, 您最担忧的问题是什么?

莫: 《世界经济展望》已经明确提出了这些担忧: 在私人 and 公共债务显著高于从前的环境下, 贸易紧张局势, 以及为适应不同金融状况所进行的调整。

从长远来看, 工资和生产率的增长是一个问题。我们要如何激励创新?

我们需要对各地的教育投资进行反思。人生早期阶段的人力资本投资对未来的成功至关重要。即便在成年后, 这些投资也能增强工作者的适应性, 延长其工作年限, 抵消人口老龄化的影响。

教育投资也有助于减轻一些可能与技术和贸易有关的调整问题。它将增强经济的弹性并提升其解决关键性长期问题的能力, 这种长期问题指的是我们尚未看到工作人口从增长中获益。现在许多国家都有这样的感觉: 劳动者的收入停滞不前, 社会流动性降低, 机会减少, 劳动者子女的经济状况没有变好, 甚至可能变得更糟。这些趋势会破坏我们的政治。

本刊: 美国和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大、最具活力的经济体。您如何看待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?

莫: 两国的分歧远远超出了经济学范畴。这些分歧从根本上涉及全球领导力问题。如果你是一个像美国这样的国家, 一个全球领导者, 一个塑造了全球治理结构的国家, 面对这种既提供合作机会又带来冲突危险的关系, 你会如何处理?

再者, 对方的政治制度和您截然不同, 你要怎么处理? 我们参考奥巴马政府处理对华贸易关系的方式, 会发现一个重要的工具——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》(TPP), 中国不在 TPP 之列, 但各国 (包括中国) 只要同意了它的规则, 就可以灵活地加入 TPP。这是一种保持美国影响力的战略, 并有可能通过软实力影响中国开展贸易的方式。

现在两国关系似乎变得更具对抗性, 当然这只是在贸易方面。我不确定对抗最终能否带来成效, 因为对抗的首要 and 中心观点是其中一国必须“赢”并占据支配地位, 而不是创建一个两国可以共存

且冲突能得到遏制的格局。

本刊：在您担任 IMF 首席经济学家的三年里，全球经济出现了哪些令人意外的发展？

莫：我刚上任时，人民币刚刚贬值，汇率制度因此改变，资产市场一片混乱。这引发了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稳定的担忧，给全球资产市场造成了影响，直至 2016 年上半年。

之后出现的意外是 2016 年年中的英国脱欧公投。当时，我们认为市场还有些不稳定，担心可能会出现不利影响。

之后不久，我们举行了美国总统大选，结果也令人意外，但也形成了新的局面。一方面，繁荣的股市可能支持美国出台更多财政刺激措施。但不利的一面是，关于贸易和基本贸易关系再谈判可能性的看法很多。一年多后，这些看法变成了行动。

这一切都是在美联储逐步推进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背景下发生的。2015 年 12 月，美联储开始上调美国利率，并始终保持这一水平，我们进入了一个对新兴市场而言金融环境更为紧缩的时期。

本刊：您觉得您的研究对政策有影响吗？

莫：我们总是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在最大程度上达到可靠、可信。如果能实现，我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。人们更担心的是如何在危机情况下给出正确的建议。因为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可能会犯严重的错误，很多人可能会因为这个错误而遭受痛苦。

2015 年 8 月，就在我上任之前，我第一次认识到这种责任。当月，人民币贬值，全球市场也开始崩溃。一些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通过推特表达了担忧和恐慌。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 (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) 主席詹森·弗曼 (Jason Furman) 当时正在休产假，所以作为委员会成员之一，我成为负责这项工作的宏观经济学者。奥巴马总统把我和财政部长杰克·卢 (Jack Lew) 召进了总统办公室。

总统对这一切表现得很冷静。他看着我，问道：“我应该担心吗？”我对自己说：“我从未经历

过这种情况，但如果加入 IMF，这种情况可能会成为家常便饭。”我用几秒钟时间考虑了一下该如何回答总统的问题。然后，我说：“不必担心。市场会自行找到立足点。就目前而言，还没到最糟糕的地步。”

奥巴马总统接着看了看卢财长：“杰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我同意。”“好的，谢谢。”总统说，“能不能让他们别发推特了？”会议就这样结束了。

本刊：您觉得您对哪方面的影响最大？

莫：从历史上看，贸易并不是 IMF 关注的重点，但我们确实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。对不平等和增长包容性的关注更加主流化。在气候问题上，我们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完成。我加入 IMF 时，有人质疑气候是否应该是我们的研究范畴。我们总是谈宏观重要性，气候威胁就是真正的“宏观上的宏观”。对全球协调失败的担忧深植于 IMF 的 DNA 当中，气候变化是我们面临的最大、最重要的问题。如果我在 IMF 的工作曾带给气候研究任何影响的话，我会非常高兴。

“我们总是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在最大程度上达到可靠、可信。”

本刊：您如何看待 IMF 角色的演变？

莫：在监督过程中，我们必须把眼光放得更远。我们都倾向于更密切地关注短期或中期的发展，但也必须有更长远的考虑，这样才能更好地挑战权威，促使他们考虑政治周期以外的遥远未来。这也需要我们拓宽思维的角度。

我们需要认识到，作为一个长期存在的机构，我们具有独特的地位，与日常政治保持着独立的距离。我认为，我们需要记住这一地位有多么特殊，并学会更有效地利用它。FD

由于篇幅所限且为了表述清晰，本文对采访稿进行了编辑调整。可在 www.fandd.org 上查阅本文的完整版。